

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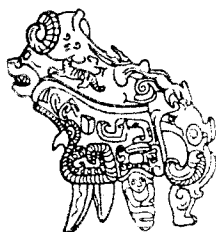
二集

1.3

0

r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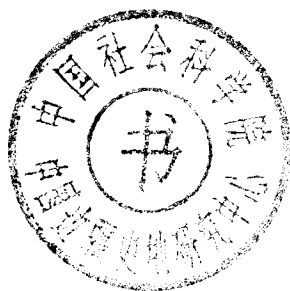




中国青铜时代

二集

张光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中国青铜时代

(二集)

ZHONGGUO QINGTONG SHIDAI

(ERJI)

张光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105,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

定价 3.60元

ISBN 7-108-00289-2/K·36

前 言

自从1982年《中国青铜时代》出版以来，我在一系列的论文中对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项重要的特征从各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这项特征便是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政权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与财富的集中紧密结合的，而财富的集中又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艺术在文明起源的程序上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古代艺术(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这种作用，在文明起源，国家起源，阶级社会起源这一类社会科学上的原则性，法则性的问题上，有世界一般性的意义。这本小书里面把这些论文集中在一起发表，可以再一次引起读者们对整个问题注意。

近来中国古史，考古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有很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最初起源的地区，与中国文明是一元还是多元这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必要的，是前提性的，而近来的讨论已经导致极有建设性的结果。可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与因果关系的问题，就是中国文明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这样形成，它的形成牵涉那些因素，它的形式如何反映它的内容——这一类的问题还比较缺乏讨论。本书所收的九篇论文，可以初步填补这一类的空白。

九篇论文都是发表过或即将发表的，原刊出处都注明在每篇题目下面。我在此对原出版者敬表谢意。因为原来各篇是分别发

表的，彼此之间在用句与引文上有不少重复之处，所以在编入本书时略有删减。

这里的讨论有不少比较有系统的收入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此书在1988年由郭净先生译成中文，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书题为《美术，神话与祭祀》。

1989.3.27

目 次

前言.....	1
1.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1985).....	1
2.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1984).....	15
3.商代的巫与巫术(1987).....	39
4.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1986).....	67
5.说殷代的“亞形”(1989).....	82
6.濮阳三趺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1988).....	95
7.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 ——续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1983).....	102
8.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1987).....	115
9.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1986).....	131

1.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 这个概念*

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上，城市的初现是当作一项重要的里程碑来看待的。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文献中有不少对什么是城市、城市在历史上什么阶段开始出现，以及城市初现的因素与契机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讨论。近年来由于龙山文化与三代早期考古遗址的许多新发现，城市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便更成为一项引人注意的课题。^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研究新旧考古材料在社会发展史上的意义的同时，把“城市”的研究上的若干基本观念澄清一下，应该是有助于进一步的讨论的。这篇短文的主要目的是从中国初期城市的若干特征出发来讨论一下城市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上应如何在概念上加加以处理的问题。

西方社会科学里面对“城市”(city)、“城市生活方式”(urbanism)与“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urbanization)这一连串的概念的研究和讨论，由来甚早，内容也很复杂，在这里不必详细追述。^② 晚近西方考古学者所常用的关于城市的定义，多源于英国史前学者

* 原载《文物》，1978(2)，61—67页。

① 或见：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1)，148—157页。

② 如：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950年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规划评论》杂志里发表的题为《城市革命》的一篇影响力甚为深广的文章。^①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从历史上——或说从史前史上——把城市作为导致社会进化上的一个新的经济阶段的一次‘革命’的结果与象征而提出。‘革命’这个词自然不可看作是指称一次突然的剧变的；它在这里用来指称在社群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上一种逐渐变化的高潮——这个高潮造成受其影响的人口急剧地增加，或至少与这项增加同时出现”^②。柴氏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便是社会史上的一次这种规模的“革命”；他相信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土地上(事实上在全球多处土地上)还经历了两次类似的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和“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城市革命的结果便是“城市”在人类史上的初现。从考古学的资料中来界定城市，柴氏举出了十项标准：

(1)最初的城市较过去任何聚落均为广大，其人口亦较稠密。苏末尔城市的人口据估计在七千到二万之间；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城市人口可能接近两万。

(2)城市人口的构成和功能与前迥异，包括不从事农业、畜牧、渔捞或采集以取得食物的其它阶层——专门化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吏与僧侣。

(3)直接生产者必须向神或神权下的国王缴纳赋税，以产生剩余财富的集中。

(4)规模巨大的公共建筑不但标志城市与前此村落之异，而且作为社会剩余财富的象征。

^①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 XXI, No. 1, pp. 3-17, 1950.

^② 同^①, p. 3.

(5)僧侣、官吏和军事首长形成统治阶级，从事计划、组织等劳心活动。下层阶级从事劳力。

(6)财富的经营迫使文字的发明。

(7)文字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科学的产生——算学、几何学、天文学。

(8)由剩余财富所供养的其他专家从事美术的新活动，其美术的概念化与复杂化造成各城市中心美术之差异。

(9)剩余财富更用于外来商品之输入，造成原料贸易的发达。

(10)由于原料能够输入，同时受到以居住地位（而非亲族地位）为基础的国家的保护，专门化的工匠成为城市政治构成的下层成员。

柴氏的十大标准如加以简化，实指古代社会演进过程中从事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但对这种分化的动力，亦即剩余财富产生的基础，柴氏在《城市革命》这篇文章里没有清楚说明。从柴氏的其他著作中，我们知道他是强调生产技术的进步与贸易活动的发达在城市革命发生上的重要性的。在《人类创造自己》(1936)一书里，柴氏强调了在产生古代文明的泛积河谷平原上灌溉工程与广泛贸易活动的兴起在城市革命上的重要性^①；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42)一书里，他更明确地指出“冶金术、轮子、牛车、赶货的驴和帆船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组织的基础”^②，亦即指生产工具、灌溉工程工具与贸易运输而言。换言之，柴氏城市革命的中心概念，是由生产技术与贸易的发达而导致的经济起飞造成社会内生

① Gordon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The Rationalist Press, 1936(引自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1, p.115).

②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Penguin Books, 1942, 修订版:1954, p.86.

产与非生产活动人口的分化，形成城市革命的基本动力。

继柴尔德氏之后，西方考古与古史学者继续在城市起源问题上作热烈的讨论，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但思想的主流，并没有产生本质上的改变。^①这是因为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西方文明史(自两河流域及波斯一直到古典的欧洲)从考古学与历史上对这种城市起源的看法加以实质上的支持的缘故。西方文明史上最早的城市一般以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的两河流域的苏末尔城市乌鲁克(Uruk)为代表。在这个时代的乌鲁克城的考古遗迹中出现了三项新的重要的文化成分，即巨大庙宇的建筑、长圆柱形印章的产生与楔形文字的创造。这些新的成分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当地经济贸易活动的起飞。^②

既然西方社会科学是西方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也可用来做为新旧社会科学法则讨论的基础。讨论中国城市史必须澄清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根据考古与文献材料，应该依照西方社会科学家根据西方文明史归纳出来的城市定义来寻找城市的初现，还是应该在中国聚落史的材料里找寻它自己的聚落形态的发展过程与规律，而在这个过程中辨认城市这一聚落形态在中国社会史中的实际界说？

要回答这个方法论上的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掌握一件历史上的事实，即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相当显著的不同。傅筑夫氏在讨论城市的起源时曾经指出，“中国

^① 如：C.H.Kraeling and R.M.Adams, eds., *City Invincibl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0; Robert, McCadam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1966.

^② C.C.Lamberg-Karlovsky and J. Sabloff, *Ancient Civilizations, The Near East and Mesoamerica*, Menlo Park, California, The Benjamin/Cummings, 1979, p.145.

封建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城市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因而中国古代城市在整个封建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亦完全不同。”^①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从城市的起源上来看，中国古代的城市与欧洲古代的城市，两者〔其实也有〕本质的不同。”^②中国最早的城市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费孝通氏把近代中国的城邑叫做“在权力居于武力这种政治系统里面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③。这个界说，是完全适用于中国最古的城市的。

傅氏所说“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这与上述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他跟着又说，“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④这个说法也是有力的，但是是比较片面的。对城市的防御作用的强调，专就中国史籍而言，是跟着“鲧作城郭”一类古代传说中对城郭的强调而来的。《礼记·礼运》也说，“今大道既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也强调了城郭沟池保护私有财产的一面。但从考古材料全面来看，城市的初现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史的过程中，是由一系列的互相联系的变化而标志出来的，其中城郭的出现只是一项。以商代二里冈期与殷墟期的考古材料为准，这种新的聚落形态所包括的在考古材料中有所反映的因素，通常至少有下面这几项：

①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上册，321页。

② 同①，322页，原文作：“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③ Hsiao-tung Fei, *China's Gentr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95.

④ 同①，323页。

- (1) 夯土城墙、战车、兵器；
- (2) 宫殿、宗庙与陵寝；
- (3) 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迹；
- (4) 手工业作坊；
- (5) 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

这几项因素显然是彼此之间作有机性的联系的，并且是互为因果的。这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人看来很明显，其中的线索也很清楚，这里不必详加解释。换言之，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与其说它是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如说它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甲骨文中的“作邑”卜辞与《诗经·绵》篇等文献资料都清楚表明古代城邑的建造乃是政治行为的表现，而不是聚落自然成长的结果。这种特性便决定了聚落布局的规则性。《周礼·考工记》所记“匠人营国……”这一套规矩是来源久长的，虽然规矩的细节自三代到汉一直是在变化着的。夯土城墙、战车、青铜兵器等遗迹遗物，在考古材料中反映着战争的剧烈与频繁，但斗争的对象，与其说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如说主要是国邑与国邑之间侵犯兼并性的斗争，亦即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斗争。规模巨大的地上建筑的宫殿与小型的、内容贫乏的半地下室作强烈的对比，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象征，也是借其规模气氛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宗庙、陵寝和青铜、玉等高级艺术品的遗迹遗物，以及祭仪的遗迹如牺牲或人殉之类，一方面是作为政权基础的宗法制度的象征，一方面是借宗教仪式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这在几篇拙著里有比较详细的讨论。^①至于手工业的作坊，除了少数与生产工具有关，

^①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政治》，《新亚学术集刊》4(1983)，29—35页。

多数是青铜器、玉器、骨牙器等仪式性的艺术品的作坊；它们一方面代表生产活动的分化，一方面更清楚地表现政治权力工具的制造工业。

中国初期城市之为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这一点，又表现在三代迁都的规则性上。从历史文献上看，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屡有迁徙。夏都有禹居阳城（又都安邑、平阳，一说晋阳），太康居斟郟，相居帝邱（又居斟灌），宁居原，迁于老邱，胤甲居西河，桀居斟郟。①殷商史上迁都“前八后五”，其中立国之后的五迁六都一般都说是汤居亳，仲丁迁囂，河亶甲迁相，祖乙迁耿（或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②西周则自太王到平王迁都五次：岐周、程、丰、镐、郑和洛邑。③为何三代迁都如此频繁？讨论这个问题的大有人在，其说法大致有两派，一主张游牧生活，一主张政治因素。持前说者有丁山，谓帝王都邑由流动而渐趋固定，是国家政治发展之常则，因为“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④。傅筑夫说都邑之屡徙乃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牧”⑤，与丁说相近。这种说法，在原则上虽不无可取，却与我们目前所知殷商农业技术水平不尽相合。我们所比较倾向的说法，是三代迁都的原因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黎虎说殷

① 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61（1980），5，2页。

② 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说起》，《文物》1973，（7），5—14页。

③ 常征：《周都南郑与郑桓封国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3），15页。

④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1935），87页。

⑤ 同第5页①，47页。

人屡迁都是“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所引起王室与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殷王每借迁都以重整王室力量^①。邹衡则主张殷商之迁都乃是为了作战的考虑：“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战胜夏王朝及其残余势力。盘庚迁殷……就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②齐思和也说周都自西东迁亦出于与殷商争夺政权的动机：“文王之迁丰，不徒便于向东发展，与商争霸，抑丰镐之间川渠纵横，土地肥饶，自古号称膏腴之地。”^③其他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繁多，上面几位可以作例。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里，我们尝试指出三代都城迁徙上的一个规律，并试求其解释。这个规律是：“三代国号皆本于地名。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象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圣都不变，缘故容易推断；而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④

讨论这个问题的焦点，是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的中心地位；这在上文已经略谈。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

① 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4），42—55页。

②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210页。

③ 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30（1946），87页。

④ 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5（1984），51—71页。

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这中间的关键线索便是如此的直截了当。

三代中以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数最多，但其铜锡矿石的来源尚未经过科学的分析。石璋如曾根据古代的地方志和近代矿业地志查出来全国124县有过去出铜矿的纪录。其中位于中原的，山西有12处，河南有7处，河北有4处，山东有3处。如以安阳为中心，则在距安阳200公里之内的铜矿，山东有1处(济南)，河南有3处(鲁山、禹县、登封)，而山西有7处(垣曲、闻喜、夏县、绛县、曲沃、翼城、太原)。

“据此则殷代铜矿砂之来源，可以不必在长江流域去找，甚至不必过黄河以南。由济南而垣曲、而绛县、而闻喜，在这中条山脉中，铜矿的蕴藏比较丰富。胡厚宣《殷代舌方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认为舌方即今之陕北。……如果舌可能为矿的话，则挖矿的叫舌，舌方即矿方，即晋南一带。……舌方并非单指某地，是指出铜矿的一带而言。舌方应该贡矿，出矿而不来贡是应当讨伐的，所以卜辞有出不出、来不来的记载。武丁是殷代铸铜最盛的时期，所以要维护铜矿的来源，不惜大动兵力，或三千，或五千，甚至王自亲征。从地域与征伐来观察，讨伐舌方，实际上等于铜矿资源的战争。”^①

虽然这个说法中有若干点令人难以同意(如舌方即矿方，在晋南)，但把铜矿与征伐相连接起来看则是很有启发性的。晋南除了铜矿以外，还有华北最为丰富的盐矿，在中国古代的确是一个富

^① 石璋如：《殷代的铸铜工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1955)，102—103页。

有战略性资源的地区。从这个观点把三代都看进去，则三代中第一个朝代夏代之崛起于晋南，第二个朝代商代之发展自东徂西，以及第三个朝代周代之自西而东的发展趋势，就都很快的显露出一一些新的意义。图四将石氏所找到的出铜矿和出锡矿的县份注出，看看它们与三代都城分布的关系。这些出铜锡矿的地点集中在华北大平原边缘的山地，而以豫北、晋南为中心。这些矿都较稀薄，以三代取铜锡量之大，每个矿产地维持开采的时间可能相当有限。丁文江在《中国矿业纪要》中说：“中国铜矿分布甚广而开采亦最古，然观其历史，铜业之中心，东汉为豫浙……，在唐为晋鄂，在宋为闽赣，在明清为川滇，一地之兴，殆无过三百年者。”^①更早的青铜时代，需矿量之大是很惊人的。照《中国古代冶金》所说，“在古代即使选用最富的矿石，每炼一百斤铜恐怕也要用三、四百斤或更多的矿石。”^②这个估计恐失之于过于乐观；如果把当时技术管理等各方面水平以及矿石质量不齐等因素都考虑进去，五比一恐怕是更合乎实际的比例。1976年殷墟发掘的妇好墓所出青铜器的全部重量据估计达1625公斤。^③如果锡矿与锡的比例与铜相似，那么这一个中小型的墓中所出的青铜器便表明需要8吨以上的矿石。1978年在随县擂鼓墩的曾侯乙墓中挖出来青铜容器140件，青铜钟65件，青铜兵器4500件。^④器物的重量还未见有完全的统计，但其中容器与编钟异常重大：有两件容器重达320与362公斤，而最大的钟重204公斤。说这个墓中出土青铜器全重

① 《中国矿业纪要》，第一号，41页。

② 《中国古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28页。

③ 《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15页。

④ 《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与论文汇编》，湖北省博物馆，1979；《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

在10000公斤以上，可能是合理的估计，那么便需要50吨以上的矿石才能冶炼出这些青铜。象这种用法，比较稀薄的铜锡矿很快的便到了不能进一步开采下去的地步，因此当时恐需随时寻求新矿。那时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图四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夏代都城的分布区与中原铜锡矿的分布区几乎完全吻合。商代都城则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巡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周代的都城则自西向东一线移来，固然可以说是逐鹿中原所需，也可以说是觅求矿源的表现，因为陕西境内铜锡矿源都较稀少。这些现象都很清楚地表现了三代都城作为服役王室从事政治权力斗争工具的性质。都城是众城之首，它在城市的政治性上应该是有很大的代表作用的。

把中国初期城市这一个特性说明了以后，我们便可试求解答中国城市起源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在中国考古与历史的资料中如何辨认这样界说的城市在中国最早出现及在何种情况之下最早出现的问题。第二个是这种城市的性质与文首所介绍的按西方社会科学思想所归纳出来的城市不相契合所引起的城市定义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要仰仗中国考古工作者与上古史学者更进一步的工作，这里我们只能作一些非常初步的讨论。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二里冈期的商代城市是具备上述初期城市的特性的；事实上它们是在辨认这种特性上所根据的主要资料。这一时期的商代遗址已经发掘了很多，其中至少有三处已发现夯土城墙，即郑州、偃师与黄陂盘龙城三座商城。这些城址除了有夯土城墙以外还具有宫殿式的大型夯土基址，有手工业作坊，有